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3.05.004

# 罗亦农革命观的主要内容、形成基础和价值意蕴

赵红

(烟台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摘要:**罗亦农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的革命观内容丰富、内涵深刻,涉及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革命活动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如工农联盟、海军运动、武装斗争等,体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规律的探索 and 认识水平。罗亦农的革命观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根植于近代中国国情,是在他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适应革命实践需要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理论宝库中的璀璨明珠,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坚定自信、英勇无畏、宽容博大的精神品格,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关键词:**罗亦农;革命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民族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3)05-0026-07

在近代中国,为了进行救亡图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人民进行了民族民主革命。这一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其中“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sup>[1]637</sup>。对于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担负起坚决奋斗的责任”<sup>[1]632</sup>,不断地进行理论探索与伟大实践。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罗亦农以敏锐的目光和开阔的视野洞察中国革命,以无畏的精神和英雄的气概投身中国革命,形成了丰富而深刻的革命观,为争取中国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目前,学术界已对罗亦农的党建思想、工农思想、农民问题理论等进行了专题研究<sup>①</sup>,但尚未从观念史的视角对罗亦农的革命观的形成进行全面考察,尚未论及罗亦农对武装斗争及海军运动的认识,对其革命观的形成基础与历史贡献也未给予充分关注。研究罗亦农的革命观,有助于深入

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理论发展脉络,有助于探究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的影响,有助于考察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孜孜追求,有助于透视伟大建党精神并从中汲取智慧伟力。基于此,本文拟对罗亦农的革命观作一探讨。

## 一、罗亦农革命观的主要内容

罗亦农的革命观系统且深刻,涉及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过程中面临的诸方面问题,体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与探索。

### (一)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关系中国革命走向与成败与否的中心问题。为此,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其中,罗亦农结合当时的斗争实际,旗帜鲜明地提出

收稿日期:2023-05-28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山东海防历史文化研究”(22CLSJ08)

作者简介:赵红(1978—),女,山东泰安人,历史学博士,烟台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①相关的学术成果有:彭宗林《罗亦农》(《湖南党史月刊》1990年第7期),金再及《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罗亦农》(《燧石》1995年第2期),曹建英、周纪青《罗亦农在中共党史上的独特贡献》(《湘潮》2002年第3期),曹建英《罗亦农对我党农村武装暴动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谢武军《罗亦农对中共党校事业的开拓性贡献》(《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黄琴《论罗亦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李良明《中共创建前后的罗亦农》(《中共创建史研究(第2辑)》2017年),黄森森、赵子林《论罗亦农对党建工作的早期探索及其现实启示》(《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22年第1期),等等。

了自己的主张。

1923年6月,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党的三大对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力量得出了片面的结论<sup>[2]109</sup>;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力量较弱,“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sup>[3]10-11</sup>,因此国民革命的“中心势力”和“领袖”应为中国国民党<sup>[3]20</sup>。对此,远在莫斯科的罗亦农认为其“缺乏了积极的主张”,同时指出无产阶级是“现在共产党的革命主要的力量”<sup>[4]5-6</sup>,表达了对无产阶级地位和作用的重视。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进行以及国内外革命形势的发展,罗亦农更坚定了这种自信,认为“担负国民革命的只有无产阶级,故中国共产党要积极指导国民党”<sup>[4]31</sup>。这一认识在当时具有相当程度的前瞻性,对后来党的四大能够提出无产阶级应“有力的参加”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sup>[5]9</sup>这一观点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北伐开始后,随着革命的深入、国民党新右派势力的发展和国共关系的日趋复杂,罗亦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化。1926年7月26日,罗亦农在中共上海区委特别扩大会议上强调指出,中国的革命“要无产阶级夺取领导地位,夺取小资产阶级群众”<sup>[4]102-103</sup>。在当时革命形势复杂、党内认识模糊的情况下,罗亦农能够始终强调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 (二)关于工农联盟问题

工农联盟问题是中国革命中的又一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并在中共四大上提出了工农联盟的思想,明确指出农民“天然地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sup>[5]8</sup>。这一理论成果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罗亦农的贡献不可忽视。

罗亦农是中国共产党内较早认识到工农联盟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早在1923年5月7日的中共旅莫支部临时大会上,罗亦农就建议将大会的《训练部对于训练的草案》中的“工人运动”改为“工农运动”,因为“中国农民最多,这样比较确切”<sup>[4]407</sup>。1924年9月,罗亦农进一步指出,“共产党非极力去组织群众不可——就是工人农民”,以“预备革命的基础”<sup>[4]5-6</sup>。1925年3月从莫斯科回国后,罗亦农在斗争实践中越发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在诸多报告或文章中深刻阐释了工农联盟思想,认为“工农联合是革命成功和维持革命胜利的保障”<sup>[4]52</sup>,并提出了

“工农联合万岁”这一催人奋进的革命口号。紧紧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和政治优势,工农联盟思想就是对这一优势的彰显和发扬。作为“一个大的‘群众党’”<sup>[6]25</sup>中的一员,罗亦农对这一思想的探索和践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初心使命的矢志坚守与不懈追求。

## (三)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发展前途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早期共产党人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入、逐步明晰的过程。在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上,中国共产党在深刻分析国际形势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基础上,并结合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sup>①</sup>,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此后,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等都撰文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使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逐渐清晰。对此,罗亦农也进行了认真思考。

1924年1月26日,中共旅莫支部常会召开会议。会议认为“目前中国国民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sup>[4]408-409</sup>。对于国民革命的前途,罗亦农认为只要中国的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完成。1924年12月27日,他在《对中央工作的意见报告》中说,“国民革命过程中的性质是非常复杂的,其‘资产阶级性的一部分要求,从目前帝国主义的动摇与矛盾中去观察,是有达到的可能。这个达到是不关于中国资产阶级之自己起来了与否,而是世界的革命势力必然要指挥中国的工人、农民来促成他’”<sup>[4]10</sup>。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后,随着国民党新右派势力反革命面目的日渐暴露,罗亦农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开始把目前进行的革命与以往的民主革命区别开来,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特别是在酝酿和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过程中,罗亦农的认识逐渐清晰而坚定。他说,“中国革命的前途,必须是革命的工农与小资产阶级联合,战胜一切反动势力,直接取得政权,建立民主独裁制”,而要实现这一前途,中国共产党“应完全取得领导的地位,丝毫不能退让,以为革命成功之保障”<sup>[4]264</sup>。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罗亦农对于中国革

<sup>①</sup>中共二大是1927年前唯一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的中共代表大会。尽管如此,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高君宇、张国焘、王尽美等人把大会精神直接传达给二大与会代表们,使二大直接吸收了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参见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页。)

命前途的思考已具有了中国共产党应该争夺进而掌握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权的思想意蕴,这是他在血与火的斗争实践中得出的真知灼见。

#### (四)关于武装斗争问题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正如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所说,“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革命的胜利”<sup>[1]610</sup>。对于武装斗争的认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罗亦农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早在莫斯科学习时,罗亦农就主张对帝国主义和军阀进行武装斗争,他说:“我们是要在每一次的事变,更提高革命的怒潮,准备二次的继起”,“要很快的会武装自己的群众或解除军阀的武装,成为自己的武装”<sup>[4]15</sup>。当然,这时因受共产国际指导思想的影响,罗亦农是寄希望于国民党左派担负起进行武装斗争的责任的。后来,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罗亦农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掌握武装的重要性。1926年10月24日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后,罗亦农在中共上海区委召开的总结会议上说:“过去我们只是要资产阶级出来,而我们只是后面跟着进行,以后我们要一面拉拢他们,一面要抱定推动的态度,不要太对他们谦让。现在政局已改变,我们特别要以自己为主体而推动他们,一方面特别准备自己的力量”<sup>[4]151</sup>。基于这一思考,罗亦农提出了“一切同志武装起来”<sup>[4]155</sup>的口号。1927年3月25日,罗亦农在中共上海区委扩大活动分子大会上指出,要“拥护工人武装”,“上海工人在C. P. 下领导全中国革命影响全世界”<sup>[4]293</sup>。第二天,罗亦农在中共上海区委活动分子会议上再次强调,在上海“政局已有非常危险的局面”的情况下,“维持工人武装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如果国民党“右派军队要来缴械,我们绝对武装抵抗不稍退让”<sup>[4]297-298</sup>。大革命失败后,在八七会议上,罗亦农把党没有重视武装斗争作为革命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他说:“党不注意夺取政权的武装,上海、湖南都是半途而废,这是非常错误的。”<sup>[4]317</sup>

罗亦农关于武装斗争问题的探索心路,反映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水平。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北伐时期,“我们党虽已开始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还没有彻底了解其重要性,还没有了解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

式”<sup>[1]609</sup>。

#### (五)关于工农武装割据问题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而是以大无畏的精神在荆棘中逐渐开辟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即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这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其核心内容是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在探索这一披荆斩棘寻新路的艰难过程中,罗亦农同样作出了有益探索,而且是党内较早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领导人之一。

1927年10月起,罗亦农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代行中央职权,负责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七省的革命运动与党务工作<sup>[7]555</sup>。走马上任之初,罗亦农就对湖南与湖北的土地革命、农民暴动和局部割据等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他说,湖南和湖北是“中国土地革命的中心区域”,因此要“坚决的发展土地革命”,“发展各地的农民暴动”<sup>[4]329-330</sup>。两湖秋收起义暴动失败后,罗亦农在对暴动进行总结时说,在将来的“有组织的暴动”中,“省委的争斗方法为游击”,要“发展土地革命的宣传与鼓动”,要领导“农民攻城或占据某几县为农民革命的根据地”<sup>[4]333</sup>。1927年10月29日,罗亦农又进一步指出:“积极发展土地革命,目前主要的争斗方法为实行与扩大游击战争。各省必须……占据县城或割占数县以为各地土地革命发展之村镇”<sup>[4]365</sup>。由上述可见,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罗亦农就已经初步认识到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以游击战争为主要形式)和根据地建设是发展中国革命的三个法宝,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一卓识远见成为中国革命新道路开辟过程中的闪亮火花。

#### (六)关于海军运动问题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起,就十分注意在海军中培养革命骨干。在党中央的培养下,1923年烟台海军学校的青年学生郭寿生成为烟台第一位共产党员。他创办了《新海军》月刊和新海军社,积极开展新海军运动,增强了党在海军中的影响和力量。对此,曾留学苏联的罗亦农给予充分肯定和支持,并将海军视为工人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争取和鼓励海军进行革命工作。

在罗亦农、王荷波、郭寿生、赵世炎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中国海军的部分舰艇参加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第一次起义时,因信号没有按

时传出,海军未能按原定计划行动,最终失败。第二次起义时,海军“建威”“建康”两舰准时向高昌庙兵工厂开炮。第三次起义时,“新海军社”的部分官兵与工人纠察队并肩作战,一举攻克了高昌庙兵工厂<sup>[8]</sup>。对于海军的卓越表现,罗亦农给予了称赞,他说,“海军问题,过去不成问题,现格外好”<sup>[4]170</sup>,“海军开炮是工人力量”<sup>[4]242</sup>,“海军之开炮,为数年来至(之)不易得的行动”<sup>[4]245</sup>。在第二次武装起义之前,为加强海军工作,保证起义的成功,罗亦农在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上要求,在中共上海区委领导下“组一支部,每船有二人组小组。中央组海军三人会议,专门讨论”<sup>[4]171</sup>,以王荷波和赵世炎为指导员。第二次起义失败后,罗亦农又强调:“极力保持海军实力并扩大之(与以精神和物质上的援助)。”<sup>[4]243</sup>

海军力量的强弱及其政治取向是影响革命成功与否的重要环节。以罗亦农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显然抓住了这一点,并为之倾注了较多心血。这彰显了中国共产先驱领袖的敏锐眼光和卓越智慧,也凸显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已经将中国海军之时代责任和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结合起来的关注与思考。

## 二、罗亦农革命观的形成基础

罗亦农的革命观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根植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时代,是在他不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学的基础上以及革命斗争实践过程中形成的。

### (一) 近代中国历史是其社会基础

近代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剥削与压迫之下,民族危机逐步加深,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人民生活日趋贫困。这种风雨如晦的黑暗时代,是促使罗亦农投身革命洪流并逐步形成自己革命观的社会基础。

罗亦农早在私塾念书时,就酷爱听那些正义凛然的英雄人物的故事,他曾在一本魏碑字帖上写下了“铲除恶势力”五个大字。11岁时,罗亦农去湘潭县下摄司向家塘郭月钦门下读书。老师的渊博学识和开明思想及其对社会状况的剖析和对各种救亡运动的讲授,对少年时代的罗亦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他懂得了一些新思想和新道理。1916年,14岁的罗亦农去湘潭县美国长老会办的益智学校上学。在校期间,罗亦农并不愿意听那些荒诞的神学课,多次冲出校门,参加反日游行示威。1917年底,为了摆脱神学的思想桎梏,他毅然退

学。1918年底,有感于乡村的黑暗和旧社会的污浊,罗亦农向父母提出去上海求学的要求,但被拒绝。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爱国热潮猛烈地冲击着湖南各地,湖南全省学校相继罢课。罗亦农深受影响,积极投身其中。他创设平民半日学校,参加国货贩卖团等爱国活动。这些经历使罗亦农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情日益高涨<sup>[7]544</sup>。五四运动后,罗亦农怀揣着爱国救亡的一腔热情毅然离开了家庭,奔赴上海寻求真理,探求出路。

此后,在学习与革命的过程中,罗亦农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及中国军阀勾结帝国主义祸害中国的反动面目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在各种报告中指出:“半殖民的中国已成帝国主义之最后竞技场”<sup>[4]9</sup>,“帝国主义者是要极力侵略殖民地以维持寿命”<sup>[4]31</sup>,“中国的内乱为什么循环不已?是不是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范围的冲突,各想扶一军阀互相争斗所演成的把戏呢?”<sup>[4]46-47</sup>“中国的军阀、官僚、政客、买办都没有独立的力量,更加没有政治的知识,他们所以在社会上扰乱,做出许多滔天大祸出来,都有帝国主义者在后面发纵指使。”<sup>[4]76</sup>“现在矿山、铁路、纱厂、轮船及银行、商业等,最大部分在外人之手,所以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非常薄弱。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目的在剥削中国工农,所以便为其本身之发展而勾结土豪劣绅军阀。”<sup>[4]352</sup>

正是基于对中国黑暗动荡社会局势的洞察与分析,罗亦农逐渐认识到中国进行革命的必要性及其任务,他说:“我们跑到革命的上来,是中国宗法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根本动摇,和外国帝国主义侵掠的结果”<sup>[4]1</sup>,革命的任务和目标就是“打倒制造内乱的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军阀,以谋民族的独立”<sup>[4]47</sup>。

### (二)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其理论基础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sup>[9]202</sup>。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罗亦农非常重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真学习与不断实践,这为他革命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奔赴上海后,罗亦农曾在一家小报馆当校对工人,他在这里学习了很多新知识,并阅读了《新青年》《劳动界》等杂志,初步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陈独秀的帮助下,罗亦农参加了“外国语学社”、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这一时期,罗亦农勤奋学习俄文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不

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1921年5月,为了寻求救国的真理,罗亦农赴苏俄留学。在莫斯科期间,罗亦农全面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为他探究和分析中国革命问题提供了思想武器。在1924年中共旅莫支部大会上,罗亦农说:“这次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宣言,虽然分析中国的政变很清楚,但是缺乏了积极的主张。这种原因,由于国民党分子的捣乱,所以取旁观的态度。但马克思说,一种革命决不能取中立的,非在政治上、经济上有大的破坏不可!组织群众都是在这种政变中才能得到。马克思分析法国大革命就是这种原因。”<sup>[4]5</sup>在1925年1月的中共旅莫支部大会上,罗亦农说:“西欧无产阶级也非帮助东方民族革命不可。这就是列宁主义所特到之处,也就是第三国际的西方无产阶级与东方国革命联合战线的意思。”<sup>[4]31</sup>1925年4月26日,罗亦农在《今年五一国际状况》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发展的最后一程,列宁所谓垂死的资本主义。”<sup>[4]37</sup>正是在这种自觉学习和运用的过程中,罗亦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筑牢于自己的革命观之中,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和坚定实践者。

### (三) 艰苦而英勇的革命斗争是其实践基础

革命斗争是革命理论得以形成的实践基础和智慧源泉。作为中国共产党“最英勇的战士”,罗亦农在其光辉而短暂的一生中,以最“热烈的革命精神”<sup>[10]3</sup>投入到中国革命洪流之中,在不断的斗争实践中锤炼意志、凝炼思想,最终形成了自己的革命观。

罗亦农1925年初从莫斯科回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广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广东区委宣传部长、江浙区委书记,1927年起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这段岁月中,他肩负重任,不辞劳苦地领导和指挥这些地方的革命,并善于从革命中总结经验教训,汲取奋进的力量。在大革命时期,他认真思考国共合作问题,注意加强党组织的建设,积极投身工农运动。在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中,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不断从失败中奋起,最终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在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了八七会议,深刻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认为“党不注意夺取政权的武装”,“这是非常错误的”<sup>[4]317</sup>。会后,他积极贯彻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方针,积极准备和领导湖南、湖

北两省的秋收起义。在这个过程中,他进一步认识到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性,初步萌发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总之,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罗亦农逐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残暴本性,认识到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认识到农民群众的力量,认识到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最终形成了自己的革命观。

## 三、罗亦农革命观的价值意蕴

20世纪20年代,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革命”一词作为中国使用次数极高<sup>[11]385</sup>的政论词汇之一,迅速汇聚成一种具有广泛影响且逐渐凝固的普遍观念,并被诸多党派视为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实现国家统一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手段<sup>[12]503</sup>。在这种时代特征下,罗亦农的革命观无疑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话语的表达和革命斗争的开展有着无法忽略的价值与贡献。

### (一) 丰富了中国革命早期的革命理论宝库

如何正确认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面临的重要课题,这一课题能否得到较好的解决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前途问题。为此,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罗亦农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肩负起民族民主革命的使命并为之不懈奋斗。随着革命的逐步进展,一些没有现成答案的重要问题摆在了党的面前,如革命的性质和目的问题、革命联合战线问题、革命的主力军问题、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共产国际的指导问题,等等。对此,罗亦农有着深邃的洞察力,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关于革命的目的,罗亦农提出建立工农与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这反映了早期共产党人建构新型民族国家的理想、目标和路径。关于大革命时期民主联合战线问题,罗亦农的主张起初带有很鲜明的苏俄革命经验色彩,但随着中国社会政治和革命形势的变化,随着中国共产党自身组织的发展,特别是到了大革命后期,罗亦农的认识逐渐走向深入,他和赵世炎等人较早觉察到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并于1926年7月代中共中央起草的《上海工作计划决议案》中明确把蒋介石视作新右派的代表,提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恩

来提出以“五万精兵”在一月内“削平蒋的势力”的意见,罗亦农“极端赞成”,并与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李立三等人致书中共中央,建议“迅速出师,直指南京”<sup>[4]499</sup>。对于共产国际的指导问题,八七会议上,与很多同志“都说国际是无错误的”不同,罗亦农则“公开的批评国际”<sup>[4]317</sup>,认为共产国际在技术层面的某些错误指挥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罗亦农的这些远见卓识,与当时党内存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形成了鲜明对比,为处于至黑至暗时刻的中国革命带来了一丝光明,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理论宝库中的一颗闪亮明珠。

### (二)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进程

作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进程。在这个过程中,罗亦农有着独特的贡献。罗亦农认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此才能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早在1923年11月8日,罗亦农就在中共旅莫支部举行的欢迎张申府的谈话会上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要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解放无产阶级,有人以为马克思学说只是物质的满足,这是错误的;共产党要有统一意志,否则不能应付环境,也不能对付敌人<sup>[4]408</sup>。1924年8月5日,在中共旅莫支部第二次大会上,罗亦农进一步强调,学员们去俄国的目的是“为学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的经验)”,从而将自己训练“成为忠实死干、以革命为职业的共产主义者”,“在比较远的将来去担负革命的责任”<sup>[4]1-3</sup>。不仅如此,罗亦农非常注意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中国革命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符合实际的工作方针和政策。1925年4月26日,在《今年五一之国际状况》一文中,罗亦农根据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所包含的许多矛盾”,以及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现状和之间的矛盾,阐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以及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并在此基础上号召“在几层压迫之下图生存的中国劳苦人民”<sup>[4]37</sup>，“应当知道帝国主义是革命的时期,赶快的准备着与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共同担负推翻这帝国主义的历史使命”<sup>[4]40</sup>。大革命失败后,在发动城市暴动几乎成为全党共识的情况下,罗亦农却始终保持着政治清醒,对之持

慎重态度,反对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冲动的做法<sup>[7]556</sup>,这在他《对于湖北问题的答辩》报告中有着鲜明的体现。他说:“C. Y. 同志主张积极准备武装暴动是对的,但主张马上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是不对的,这样就要走入青年冒险主义的倾向。”<sup>[4]388-389</sup>这说明,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罗亦农并未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十分注意把它与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 (三) 升华了中华民族精神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与灵魂,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奋勇前进的不竭动力。这一精神伟力在近代中国“发挥了在空前的民族危难中支撑民族生存、国家命运的巨大作用”<sup>[13]67</sup>。正是在民族精神的激励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顺应历史潮流、勇担历史重任、敢于作出巨大牺牲”<sup>[14]1</sup>,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为中华民族精神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使中华民族精神获得提升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罗亦农同样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革命从来都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成功的,要有流血,要有牺牲。对此,罗亦农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革命是很复杂艰难严重的事,非随便可以干的。”<sup>[4]183</sup> 尽管革命道路无坦途,罗亦农却坚守初心、执着努力、奋勇向前,用血肉之躯诠释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意蕴。在上海工人连续三次举行武装起义时,罗亦农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第一次起义失败后,罗亦农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鼓励大家不要气馁、不要妥协,接续奋斗,他说:“暴动要经过许多时间的准备,如果群众不畏艰险,是很不容易的”<sup>[4]159</sup>,但“这次暴动是第一幕,我们要在幼稚的经验中准备二次暴动。同志不应消极,要更积极的来做革命工作”<sup>[4]167</sup>。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永不言弃的进取精神由此得以彰显。大革命失败的前夕,面对艰难的时局,罗亦农沉着而冷静,坚定而自信,他说,虽然目前时局紧要,但“未来的历史是很光明的”<sup>[4]307</sup>,所以“革命是我们领导的,我们要坚决认定积极负责,开始奋斗”<sup>[4]308</sup>。民族自信的精神品质在此涤荡了革命道路上的阴霾。此外,罗亦农的革命观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特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精神的交汇融合,凸显了中华民族宽容博大的精神品格,使中华民族精神得到了培育与创新<sup>[13]285</sup>。1928年4月15日,由于叛徒的出

卖,罗亦农在上海被捕,4月21日牺牲于上海西郊。牺牲前,他慷慨写下就义诗:“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sup>[4]</sup><sup>400</sup> 罗亦农这种为坚守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而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意志品质与英雄气概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升华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诠释,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铸就 and 传承伟大精神谱系的内核伟力与基因密码。

###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4] 罗亦农. 罗亦农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M].北京:中共党史

出版社,2014.

[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7] 刘一矛,刘景春. 罗亦农[M]//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中共党史人物传:先驱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8] 马骏杰. 中国海军参加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纪实[J].世纪,2004(06).  
[9] 习近平.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10] 布尔塞维克[J].1927(20).  
[11] 金观涛,刘青峰. 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12] 王奇生. 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13] 俞祖华. 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1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百年大事记(1921—2021年)[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Main Content, Formation Basis and Value Implications of Luo Yinong's Revolutionary View

ZHAO Hong

(School of Marxism, Yantai University, Yantai 264005, China)

**Abstract:** Luo Yinong is one of the early lead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is revolutionary view is rich in content and profound in connotation, involving many problems faced by the CPC in 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such as the alliance of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naval movement, and armed struggle, etc., which reflects the early Chinese Communists' exploration and understanding level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law. Luo Yinong's revolutionary view does not appear without foundation, but is rooted in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modern China and is formed on the basis of his continuous learning of Marxist theory and adaptation to the needs of revolutionary practice. It is the shining pearl in the treasure-house of the early revolutionary theory of the CPC,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embodying Chinese nation's spiritual quality of continuous self-renewal, assertiveness, bravery and tolerance, and demonstrating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 of Chinese Communists.

**Key words:** Luo Yinong; revolutionary view;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Chinese nation  
(责任编辑 雪 箫)